

上 篇  
经济人类学的理论  
工具及其成长



## 第一章 人类学和经济人类学

### 一 人类学的学科本质精神与研究领域的扩展

把人视为类的存在，是人的社会性发展的产物，是人的世界历史性已经成为一种经验存在的观念反映。尽管人的社会性存在和人的类整体的存在，从一开始就对人类的发展做出了最本质的规定，但人的具体历史实存及其对这种存在关系本质的理解，却始终限于一种狭隘的片面状态。

人的社会性的存在和发展，首先表现在人的群体性生存中。这种群体性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在于：刚摆脱了动物界的人类，只能聚集起个别力量为一个整体性的力量，才能和自然相对立而获得自身的发展。然而，在这种以血缘氏族组织为最初制度框架的群体性联合中，人们从未能通观世界，也从未把“人类”视为同一整体。在血缘纽带的维系下，个体追溯他们的血统直至某个共同祖先。在这其中，如 T. 拉科曼所说：

个人的个体同一性也通过与氏族集团的同一性而得到发展，这种同一是作为在相互作用范畴中被译解为自然的一部分而被依次领悟的。由于社会现实还未能清楚地从自然现实中区分出来，社会世界的边界就

消失在自然世界的边界之中。

这样，人的社会本质的同一性，仅在血缘共同体的意义上得到体现，个体也仅在这一框架内才实现了相互的认同。

在人类社会进入农业时代的数千年中，当人的历史实存从血缘共同体扩展到地缘共同体，即人对自己类本质的认识超越了直接的血缘认同，而代之以一种更为广泛的、对间接关系的认同时，展示了人从“自然共同体”到“社会共同体”的发展。这种社会共同体的发展，演成了人类地域性文明体系相对独立的发展格局。在此历史阶段中，以往在群体性联合中逐渐成长起来的个人独立发展的能力得到了普遍的确立。无论土地、作坊、农具、手工业工具等等，都具有独立操作的个体性质；无论在大庄园、地主出租地，还是在小农自耕地上，作为整个人类生存基础的生产，亦都表现为简陋的、有限的、小规模个体劳动者的活动。于是，“这里的财产主要是各个人的劳动。<sup>②</sup>它使个人相对地获得了自己“财富的独立发展”使人类获得了“个人独立发展的基础”。<sup>③</sup>但是，这种个体的发展，却始终未能获得相应的社会关系的认定，仅只提升到一个地域框架的水平，而囿于依附性的意识与社会框架中。人在经济技术体系中所获得的独立发展能力，受制于依附性的社会实存关系，形成了自我中心的历史文明观。在这种历史认识模式的主导下，当不同人类共同体以

参见 德·哈贝马斯著 张博树译：《交往与社会进化》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 115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1 卷 第 70 页。

马克思：《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3 卷 第 893、909 页。

“非类”和“异己”来加深和强调对同类其他成员的相异性存在的感受时，也就理所当然地剥夺了他们作为“人”的发展权力和存在理由，并为“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现象”<sup>①</sup>提供了道德伦理依据。从而完成了使人的差别合理化的精神努力。十分明显，这种可以暂时令人满意的，用以解释这种相异性的思想，给人类文明进程带来了沉重灾难，它使竞争、冲突、暴行和人类的自我戕害，成为了人类社会每一个进步和发展的代价。

“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现代社会，<sup>②</sup>使各个民族从以往狭隘性的地域存在转变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这一根本性的历史变革，作为人的社会性发展产物，作为人的世界历史性已经成为一种经验的存在的观念反映，实现了以个体发展为基点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关系的根本性转变。而与此同时发生的，是一个由基础性生产所导向的全面的社會化过程。一方面，在一体化的转向中，经济上久已成熟发展起来的个体独立能力得到了社会意识的确认，使个体存在价值获得了社会关系的认同；另一方面在个体发展的基点上人们又得以普遍地从“类”的角度来观察人的存在的问题同时把“人生而平等”的观念确立为整个社会最基本的伦理基础。就在这种以个体发展为基点的一体化进程中，

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

马克思：《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 卷 第 926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 卷 第 114 页。

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sup>①</sup>

每一个人既出于不同的民族体，又在世界统一框架中，每时每刻体验着民族差异和民族特性。

应该说，人类片面性历史存在的狭隘框架，一方面使人们对自身及其类本质的认识和理解的精神努力的成果——如历史学、哲学等等的学科体系——从一开始就具有深刻的内在缺陷；另一方面，在人生而平等的伦理基础上所产生的、试图使人的差别合理化的理解努力中，也使自己不得不同时面对由这种社会联系而带来的一切具有人性的存在，而从内心产生出深刻的情感忧虑。可以说，正是这种忧虑，催发了人类学的产生；也正是现代社会的“世界历史”性质，为人类学的产生提供了现实的基础。这一“基础”的涵义在于以世界性的统一框架第一次为人类全面实现自我理解及其对类本质的认识提供了可能。也正是这种可能，使人类学成为我们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展望、并获得变易的方法。因此，尽管人类学是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门新学科，但这种新的基点，却使其具有弥补以往不同社会科学学科缺陷的潜能。同时，又正是人类历史实存发展的这种复杂性，使得人类学的这种潜能并不具有直接的现实必然性。

从 19 世纪中叶起 随着对初民社会的风俗、社会结构、宗教神话和人类体质等方面研究的深入，人类学拓展成为一个领域广泛的新学科。它从一开始就展现出其学科交叉的基质，在其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学科的结合中，形成了文化人类学、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1 卷 第 68 页。

语言人类学、体质人类学、人类考古学 4 个主要领域。尽管人类学学科的基本精神，旨在描述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发展机理；揭示不同人类共同体的特征和类型；比较各种民族间的异同及其社会关系；分析文化的传播和相互的渗透与融合；解析社会制度和阐释不同的社会组织方式等等；最终归结到了在人类的广泛差异中寻求内在合理性、秩序或普同性的学术努力上，为人类的自我理解 and 自我复归开拓了新的方向。但是，在上述人类历史实存的复杂性基础上而产生的人类学，一直沿着崎岖的道路行进，甚至一度陷入背离学科基本精神的歧路。

如由体质人类学、进化论史前史和对各民族进行的心理学研究尝试的三个方面的汇合，曾一度引起人们对一种民族优越性的研究，在从研究显赫的祖先到断言其为至高无上的道路上，滑落到自我中心论的历史认识观中。又如，人类学在极具局限性的、片面的、单元一直线型的进化史观的认识论基础引导下，

从一开始就以时间进化论的构想为基础，把共同体以外的‘非我’事先放置在历史长河的‘原始’一端以确立现代‘我类’一端的文明优势。其对‘非我’在时间上的排拒 (temporal distancing) 造成时间的空间化 (patialization of time) 使其整个研究的大前提表现为把‘他们’作为‘我们’人类的过去来研究而不是关注‘他们’存在的现实意义；‘他们’的现实状况必须翻译成‘我们’的过去 才能获得其存在的意义。

刘禾：《理论与历史东方与西方》载《读书》北京：1996.第 8 期，第 3—11 页。

这种对学科基本精神的背离，进一步把人类学挤压到局限于对“原始”人群和“低级社会”研究的狭小范围，把对人类自我理解具有重要意义的人类学，歪曲成似乎远离我们的现实存在、对人类发展难以产生实际作用的奢侈的“贵族学科”。形成了把人类整体的一个部分割裂出去，来强调和塑造自我历史的优势和合理性的学科语境。

毋庸置疑的是，回归学科的基本精神，一直是人类学自身发展的潜在趋势。而在现实的发展中，人类学又以其研究领域的加速扩展，来趋近于这一潜在的趋势。尤其是功能主义方法的引入，使弗雷泽(Frazer, J.G.)于1908年提出了“社会人类学”的概念而致力于社会结构的研究；而当人们从社会存在的角度来理解文化的涵义，看到了“文化是一套生存机制，但文化也给我们提供实在的定义”时，<sup>①</sup>便以“社会”与“文化”的重合使原来的“文化人类学”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自20世纪下半期以来，“社会与文化人类学”这一新名称以巨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扩展性，构成人类学研究最主要和最活跃的领地。从其学派的发展和国外大学的人类学课程开设来看，它已以加速衍生的学科分类组成了庞大而壮观的阵容。

按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具体研究对象的不同，对其进行“原子”式的学科划分，可以排列出：

理论人类学 (Theoretical Anthropology)

语言人类学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人性人类学 (Humanistic Anthropology)

[美] 罗伯特·F·墨菲著 王卓君等译：《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第20页。

心理人类学 (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

行为人类学 (Behavioral Anthropology)

宗教人类学 (Religious Anthropology)

生态人类学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经济人类学 (Economic Anthropology)

政治人类学 (Political Anthropology)

法律人类学 (Law and Anthropology)

教育人类学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应用人类学 (Applied Anthropology)

发展人类学 (Development Anthropology)

都市人类学 (Urban Anthropology)

医疗人类学 (Medical Anthropology)

按人类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观点分类, 可分解为:

进化论人类学 (Evolutionism Anthropology)

传播论人类学 (Difusionism Anthropology)

功能主义人类学 (Functionalism Anthropology)

批判或历史学派人类学 (Critical or Historical School Anthropology)

结构人类学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认知人类学 (Cognitive Anthropology)

符号人类学 (Semiotics Anthropology)

象征人类学 (Symbolic Anthropology)

阐释人类学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现象人类学 (Phenomenalistic Anthropology)

激进主义人类学 (Radical Anthropology)

形式主义人类学 (Formalism Anthropology)

实体主义人类学 (Substantialism Anthropology)

以其研究的技术手段划分, 亦有:

影视人类学 (Visual Anthropology)

计算机人类学 (Computer Anthropology)

此外, 尚可加上最为人们所熟知的、经进一步细化或专门化的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等等。总之, 这样的学科归纳远非一个完整的系列, 并且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完整的系列。而经济人类学正是在这个系列的开放性扩展中, 逐渐成长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

## 二 经济人类学的形成

经济人类学的历史很短。<sup>①</sup>从术语的角度来说, 是梅尔维尔·赫斯科维兹在 1952 年, 吸收了弗兰克·奈特对其 1940 年发表的《原始人的经济生活》的批评观点对原书修订再版为《经济人类学 比较经济研究》后而使“经济人类学”得到了首次使用。但以实体主义学派的创建者而最为著名的卡尔·波拉尼在经济人类学的成长中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为直到 1957 年, 其闻名于今的论文《作为制度过程的经济》在《早期帝国的贸易和市场》中发表后, “形式—实体”的论战才把经济人类学确立为一个值得理论关注的领域。

然而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 马克思主义对跨文化经济的讨论, 支配并取代了这一论战。形式论者和实体论者都同样转向

参见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2 卷 E—J, 第 23—29 页。

马克思主义，并为新的信仰而奋发割断他们对前者的忠诚联系。1971年经济人类学学会的建立，标志着人类学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时代的到来。而法国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理论，如梅拉索克斯1960年的《对自给自足社会传统的经济现象解释》、1975年的《少女 饮食与货币 资本主义和家族共同体》戈德利耶1966年的《经济学的理性与非理性》、1973年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展望》等著作被翻译成英文广泛流行 演成了以形式主义—实体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为首要代表的不同学派的论战。

80年代对经济人类学的批评性论战，不再是60年代的形式主义与实体主义之间的论战，而是实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论战。这些论战指向了跨文化的、比较分析的场地 即趋向于解释不同社会中的经济，是怎样和为什么采取了特殊的形式来维系其基本的结构或是变化到与其先前的存在着性质区别的形式中。虽然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主义和实体主义表现为经济人类学中的两个“学派”但它们都源出于一个共同的理性和哲学传统，都在同样的制度模式的基本框架中运作。有人认为 共享一个模式的事实意味着 与60年代以不同模式来进行科学研究的论战的毁谤性争论相比，80年代的争论，在许多方面都更加微妙 更具诡辩性。<sup>①</sup>这些学者在不同的情境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之光中，修正和发展着马林诺夫斯基等人为人类学研究确立的一些基本原则。从文化的整体性上，提供了一个在本原意义上进行“经济”比较的视野并解析“经济”的结构。在人类学场地中，经济人类学因此而成长为一门极具发展潜力的分支

<sup>①</sup> Halperin, R. H. 1988, *Economies across Cultures: Towards a Comparative Science of the Econom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p.25.

学科。

但是，如果仅仅把目光局限于这种理论论辩，就会放弃“真正”的经济人类学历史而只展现出经济人类学的一种“虚化”历史。如奥蒂兹等人认为，这种理论性的论辩，从最好的情况看，对关注经济的田野调查者只具有次要意义，从最坏的角度看，则是一种不相干。<sup>①</sup>而格雷戈里和奥尔特曼则认为，这种论辩的焦点是“理论”与“原始证据”间的一种区分不同的首倡者站在适用性和解释力的立场，主张其特殊的理论。因此，“需要作出的区分是在原始、二次和三次资料的分析方法之间而不是在‘形式论者’、‘实体论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之间”。<sup>②</sup>他们也提出：

一些思想能拾遗于理论文献，但不应把其视为思想的惟一来源。人类学必须得到理论的阐述，但如果新思想要得到发展也必须把它们置身于田野经验中。它们既萌发于其观念的某一时段，也为当地的日常变化和世界条件所决定。任何投身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人必须确实给出一个制高点，因为它是原始资料分析的存在理由。<sup>③</sup>

在人类的历史实存中，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

① Ortiz, S. (ed.) 1983, *Economic Anthropology: Topics and Theories*.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and Society for Economic Anthropology. pp.27—34.

② Gregory, C. A. and Altman, J. C. 1989, *Observing The Econom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pp.4—5.

③ Gregory, C. A. and Altman, J. C. 1989, *Observing The Econom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p.41.

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面对如此基本的事实，以至人类学家无法避开对它们的讨论。基于此，经济分析从一开始就是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并在力图解释不同民族的社会组织的方式和机制的过程中，展示出其基础性的作用。因此经济人类学的‘真实’历史与人类学学科同样古老。

人类学之父之一的摩尔根在 1877 年写成的《古代社会》就是以经济的分析为聚焦中心而展开的对财富和政治关系的一个分析。他以 1881 年的《美洲土著的家庭和家庭生活》为他那个时代极少受到关注的话题提供了一些原始资料。随同人类学起步而展开的经济分析，形成了具有丰富资料性的经济民族史研究。马林诺夫斯基 1922 年的经典研究《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则赋予这一主题一个全新的方向。诸如马塞尔·莫斯(Mauss, M. 1872—1950)，斯朗沃尔德(Thunwald, R.)，阿姆斯特朗(Armstrong, W.) 福德(Forde, D.) 理查兹(Richards, A.) 古德弗洛(Goodfellow, D. M.) 福斯特(Forster, G. M.) 以及塔克斯(Tax, S.) 等等的重要学者沿着这一方向的行进，以经济因素的分析来解释不同民族历史文化现象的努力，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一定民族的文化与环境——包括技术、资源和劳动——之间存在着一种动态的、富有创造力的关系；一定民族的劳动类型，在很大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1 卷 第 79 页。

程度上依赖于可用的技术、与正在开发利用的资源的性质。这些劳动类型 随之也会对其社会制度 包括居住法则、血统、村社规模和位置等等 产生强烈的影响。技术为历史所衍生 环境的关键是资源 人们通过文化认识资源 通过技术获取资源。这些学者的研究 不仅角度不同 而且方法各异。他们对经济人类学的最大的贡献，则是做出了杰出的资料汇集。今天的经济人类学研究 在确立了一个正确的认识方法后 可从他们的著述中发现许多重要的和有益的东西。

经济人类学是在人类学研究范围的扩展中崛起的，人类学研究范围的扩展，又是在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中实现的。但是 如果仅仅把这个新学科的产生 视为原有的经济学与传统人类学简单相加的结果，则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因为一个新研究领域的拓展，往往也意味着对一种新视野的寻求和新的研究方法的确立。经济人类学的产生，就是看到了无论经济学还是文化人类学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看到了经济所具有的物质、数量的属性并不是经济的原因 而是它的结果 以往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上所做的那些表层分析，并不能洞悉经济的结构。如多尔顿所说：“只是因为长期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人群和组织中间具有一种结构化的生活方式（mode）社会才有了‘经济’”<sup>①</sup>。以此为人们的生存需要提供连续不断的和周而复始的结构化供给 产生了若干为保证这种供给的制度。经济人类学的意义 就是要跨越传统经济学的藩篱，去探寻潜藏在经济制度底下的深层动因 以及决定这些动因的系统。

参见 [日] 栗本慎一郎著 王名等译：《经济人类学》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第 8 页。

“经济”和“人类学分析”的涵义确定了这一学科视野和局限。“经济”意指人们为控制生产、消费和衣食住所的循环流通而构建起的社会关系。“人类学分析”意指对活生生的人们的直接观察、和对其最近历史资料的整理。其最首要的是，关注于原始资料的整理与分析。对经济人类学来说，研究的对象是位于某一时空中的一个可选人类群体。

格雷戈里 (Gregory, C. A.) 和奥尔特曼 (Altman, J. C.) 以对经济研究与经济学研究的区别，基于原始资料、二次资料和三次资料的分析层面指出，经济学家主要关切于二次资料而非原始资料的分析；他们很少到工厂或田野去收集自己的资料，与这些成员朝夕共处上几周的情况更是罕见。而人类学家的主题是“微观的”而不是“宏观的”他们聚焦的中心是原始资料的分析。因此，

对经济学和人类学进行学科区分的是方法。人类学家趋向于原始资料和二次资料分析的专门化，而经济学家却趋向于二次和三次资料分析专门化。经济学家主要依赖于官方统计来满足其资料需要。<sup>①</sup>

即便在涉及原始资料分析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看到，1925年在查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的理论》指导下而展开的一个经济学分析，便是以俄国官员借助于翻译，仅用两天便以 677 个问题组成了对俄国村庄管理的问卷。与这种简单的问卷调查方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马林诺夫斯基花了两年时间，在一个单独的地区与人们用方言交谈而形成了独特的研究。

<sup>①</sup> Gregory, C. A. and Altman, J. C. 1989, *Observing The Econom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p.6.

对经济人类学来说，田野调查并非对事实的被动记录，而是一个卷入直接观察，甚至有可能是参与被调查者日常生活的分析过程。每个具体环境在某些方面都有其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给予了田野调查者收集新资料、形成新思想并发展新的研究方法的机会。确实，马林诺夫斯基为人类学开辟了全新的方向，其显著标志就在于他的方法：在深厚的原始资料基础上，他主张以历史、政治和理论的运用形成比较的方法。<sup>①</sup>马林诺夫斯基的著作，在许多后世学者的传承中，已实现了对农业经济理解的革命化。诸如弗士 1929 年的《新西兰毛利人的原始经济》、1936 年的《我们提皮科亚人》、1946 年的《马来渔民：他们的农民经济》等代表作 理查兹 1939 年的《北罗得西亚的土地、劳动和饮食 本巴部落的经济研究》 希尔 ( Hill, P. ) 的《人口 富裕与贫困 :1900 和 1970 年的卡诺乡村》；索尔兹伯里 ( Salisbury, R. F. ) 的《武南麻米 传统社会的经济变迁》对 1880—1970 年武南麻米村庄经济的研究；福克斯 ( Fox, J. J. ) 的《棕榈的收获 东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化》对 1600—1970 年罗蒂岛的生态与经济的研究 汉弗莱 ( Humphrey, C. ) 的《马克思的集体：一个西伯利亚集体农场的经济，社会与宗教》，对一个西伯利亚集体农场从 1900—1975 年的经济、社会与宗教的研究 都证实了经济人类学的关注点。

经济人类学的主题是“微观的”而不是“宏观的”但是 正像历史学家的主题一样，所关切的是微观存在，而非微观视野。换

<sup>①</sup> Malinowski, B. 1935, *Coral Gardens and Their Magic: A Study of the Methods of a Tilling the Soil and of Agricultural Rites in the Trobriand Island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p.317.

句话说，人类学家所研究的，并非一个无形的隔离种群，而是总体人口中的一个小部分。其目的是以比较分析去从特殊性中探索出一般性。正如波斯坦所说，该方法“含有需要对社会科学的宽泛议论进行相关调查的一种认识，并进而认识到社会调查特有的缺乏及其特殊困难。”<sup>①</sup>这也表明，尽管经济人类学首要的关切，是原始资料的整理和分析，但所有研究经济的人类学者都必须介入某些类型的二次资料分析。

从理论上说，人类学分析的直接观察方法，陷入了一系列明显矛盾的综合：它是一个规范的科学探讨，却又包容非规范的探测和试验；它使用统计资料的收集技术，又对不可量化的关系给予特别的关注，它关注本土的观点，却又采取了外来者的视野；它是理论的表述，但又摆脱理论的偏见；它的方法是归纳和经验性，而又包容推理的演绎；它是政治性的表述，而又不从事不加批判的鼓动。说到底，人类学研究的直接和间接的方法构成了一个辩证体：对特殊性的直接观察是一般分析的基础，而一般理论也表述了直接的观察。<sup>②</sup>

这样，也有不少经济人类学家展开了宏观的分析，如格尔兹（Geertz, C. 的《农业内卷 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化过程》哈特 Hart, K. 的《西非农业的政治经济》都是在由大量研究者（包括作者自己）所整理的原始资料基础上，而展开的二次资料的分

① Postan, M. M. 1970, *Facts and Relevance: Essays on Historical Meth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21.

② Gregory, C. A. and Altman, J. C. 1989, *Observing The Econom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p.9.